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师史学

1
DONGSHIXUE

东 师 史 学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长春

034416

(吉) 新登字 12 号

东 师 史 学

DONG SHI SHI XUE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

责任编辑：包瑞峰 封面设计：魏国强 责任校对：左 群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制版
长春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350 千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7—5602—1504—1/K·90

定价：4.50 元

《东师史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李 洵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世力 王 旭 王永本 任 爽 李 洵
杜文君 宋衍申 赵 毅 胡维革 唐承运
程舒伟

执行编委 赵 毅 马世力 胡维革

前 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够鉴照古今。古往今来朝代兴替、人物臧否、制度得失，都要由历史最终裁决，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更不可一刻或缺，作为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要向社会各个阶层提起注意和告戒。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正猛烈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历史学科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部分目光短视者看来，史学研究既不创造钢铁又不增产粮食，似乎可有可无，无关宏旨，因此，史学研究颇受冷落。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不要历史、哪怕是对历史的任何小视，都将遭到历史的惩罚！

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历史研究不能一如既往地循常蹈故地进行，史学工作者应该调适自己的研究方向，为改革开放服务，这是时代赋予的职责。但是，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着自己的独立的方法、理论、手段和研究领域，不能像经济学、政治学那样变成纯粹的应用学科。因此，它

需要扶持，需要各级主管部门的政策倾斜。否则，提高历史学的研究品位将十分困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向历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给史学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挑战和机遇同在，徘徊和发展并存。作为历史科学的学术团体，我们就是要抓住机遇，求得发展。今天，《东师史学》与全国的同行见面了，这是我系数十名老中青史学工作者，凭着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精神献给我们时代的一份礼物。希望它对改革开放事业有所裨益，为繁荣学术研究助一道波澜，我们更希望《东师史学》能够成为与国内外同行通报史学研究信息的一个窗口。

《东师史学》从酝酿出版，到组稿、审稿，以至下厂印刷，历时一年之久。这期间，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倾注了极大热忱。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东北师大的校领导、东北师大出版社的领导给了很多关怀和支持，博士生指导教师、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丁则民、李洵、朱寰先生拨冗审读了部分稿件，对小刊的学术质量起到了把关作用。印刷费用则是系内自行筹措的。

本期刊登的二十几篇学术论文，都是我系教师或我系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撰写的，它基本代表了我系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风貌。

由于我们缺乏办刊经验，加之一些中青年教师学术造诣不高，偏颇错谬在所难免，敬希国内外同行批评教正。

赵 毅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十日
于东北师大一教

目 录

前 言	赵 毅 (1)
-----------	---------

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范式与中国史研究的

事实思考	韩东育 (1)
西周三公探源	官长为 (31)
周人的祭祀和“以祖配天”	包瑞峰 (46)
论东汉三公的人事选举权	王彦辉 (70)
五代分合与南唐军事外交	任 爽 (84)
辽代侨置州县释例	韩宾娜 (99)
论金代尊孔崇儒的历程、特点和影响	穆鸿利 (107)
明嘉、万、天启三朝禁毁书院之政治文化背景	李 洵 (120)
张居正用人政策及其改革成败	赵 毅 倪军民 (133)
明代军事镇守体制初探	罗冬阳 (143)
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的耶稣会士	姜守鹏 (163)
试论萨满教起源于东北亚	刘厚生 (177)
洋务运动历史影响新探	胡维革 (187)
清末东北地方自治运动与辛亥革命	曲晓璠 (204)
近代中国生丝出口与国内经济的变化	胡赤军 (222)
试论北京政变时期的冯玉祥	周玉和 (239)
1931—1935年南京政府内外政策述评	程舒伟 (247)
王德林吉林抗日救国军兴起与失败评析	吕永华 (258)

上古文明社会生产关系浅析	王永本	王彦辉 (274)
罗马共和国灭亡缘由浅析		侯文富 (290)
犹太战争 (66—73 年) 及其失败原因	官秀华	(309)
查士丁尼与拜占廷专制王权	徐家玲	(320)
评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政府的重大政策失误	马世力	(333)
美国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崔 丕	(35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族裔史学及其发展	丁则民	(372)
美国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由来及其对华实施状况 的历史考察	李 晔	(384)
拉丁美洲依附研究中的理论分歧	董小川	(400)
试论历史概念教学问题	张熙峰	孙永成 (416)

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范式 与中国史研究的事实思考

韩东育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曾经给中国史研究带来过灿烂和辉煌。然而，最早以该理论来系统考察中国历史的郭沫若先生，却不能不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①这一事实而表示过遗憾。而后来屡屡出现于中国史研究过程中的诸如把辩证的经济决定论变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对历史作用力的单一分析以及理论范畴的凝固化等等^②现象，除却嘲讽了中国人自古养成的“我注六经”之惯习外，倒也给郭老的遗憾（事实上应该是担心）做了注脚。这种类似于生吞活剥式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参见吴廷嘉：《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的研究所造成的史学危机竟是如此严重,以至在今日史圈当中,再也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史学理论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①当今方兴未艾的“国情学”研究表明,说我们的国情不同,似乎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是“神”,就是“猴子”。事实是,拿与中国文化没有血缘关系的理论,尤其是某些途经别国地域、又经无数人增删脱衍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充其量也只能将该理论的有效范围止于部分或个别,而不可能是普遍或全体。这恐怕也是史学界多年来不得不对历史唯物论进行增减损益并由此而争讼喧嚣的原因所在。然而,增减损益,说明我们并没有跳出窠臼;而争讼喧嚣,则表明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曾经是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之全部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会给中国史研究带来长期而普遍的争论?我想,除了中国史本身的复杂性外,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总根据的认识论范式,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与西方“两元分立”哲学的原始分歧,乃是导致以上情状的主要原因。前一段时间,有人曾提出过历史认识论问题,但由于立论不同,方法有异,故有必要在此重新提出讨论。

一、“两元分立”哲学与辩证唯物史观

恩格斯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②考之17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哲学领域内的确存

^① 参见仲伟民:《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0页。

在着由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为本原、谁为第一性而引起的激烈争论和因此而形成的两大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事实。这其实并不奇怪。在存在主义哲学所亟欲回归的笛卡儿以前的时代里，主观领域和客观领域之间的鸿沟还没有明显形成，而近代认识论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以主、客体的分离为先决条件的。笛卡儿最先提出了以“实体”概念为先导的精神与物质并行两分的经典“二元论”。笛卡儿的《哲学原理》和《哲学通信集》等著作，具体地阐述了他的“二元论”理论体系。他说：“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理解为只依赖自身而不需要他物的东西”，即“依自不依他”的存在。他认为，心灵和肉体都是实体，心灵虽然天生就与肉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却是与肉体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它既独立于人的肉体，也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其他有形的物体。他说：“我是我的灵魂，是一个没有形体的存在和实体。”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属性的概念，认为“属性与实体是相同的”。他的所谓“属性”，倘举例言之，即如果说灵魂是实体，那么，思想便是它的属性。实体通过属性得以显现，而人们又可以通过属性来把握实体。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这可以解释为：我是我的灵魂，我在思想，证明我（灵魂）是实体，是客观存在的。既然灵魂是与肉体相并立的两个实体，而不是肉体的附属品，因此，我（灵魂）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规定自己。这样，人们便自然会得出自我在本质上是自由的结论。显然，这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崛起时作为一种启蒙思想，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而提到“自我意识”，人们便自然想起洛克、斯宾诺莎，想起康德、黑格尔，想起胡塞尔与萨特。笛卡儿在《哲学通信集》和《真理的探求》中曾两次明确地使用过这个概念，而近代哲学恰恰是以人的自我反省为特征的。因此，仅就自觉提出自我和自我意识而言，笛卡儿就足以成为近代哲学的开

创者。^①但是，“二元论”却同时带来了另一重消极的东西，即分离和对立。表现在人之个体上，是心灵与肉体的分离和对立；而表现在物我人际间，则是自我与世界的分离和对立。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竟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使致力于反对他的人最终都没有跳出他的框框。被称为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洛克，是以反对笛卡儿而著称的。可是，他在承认感觉经验是外界事物作用于感官的结果的同时，却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发源于某种独立的精神实体；17世纪著名的以克服笛卡儿“二元论”为己任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在试图否定笛卡儿“二元论”的时候，最终还是把他认为是世界上两种最重要属性的“广延”和“思维”处理成互相平行、两不相干的存在和关系。同斯宾诺莎一样，黑格尔表面上看也是拒绝任何形式的“二元论”的。他在综合斯宾诺莎的“一元论”、费希特的“理念”和谢林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创造了他以“绝对精神”为最高存在的辩证唯心主义体系。他说：“‘理性’……就是实体”、“‘理性’是宇宙的实体”^②。又谓：“‘物质’的实体是在它的自身之外；‘精神’却是依靠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自由’。因为我如果是依附他物而生存的，那我就同非我的外物相连，并且不能离开这个外物而独立生存。相反地，如果我是依靠自己而存在的，那我就自由的。‘精神’的这种依靠自己的存在，就是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③说明黑格尔哲学其实并没有摆脱笛卡儿思想对欧洲各国思想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此亦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的历史观时所说的那样：黑格尔的历史观“不过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

① 参见汪堂家：《论笛卡儿的自我概念》，《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7页。

③ 同上，第56页。

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①其后的费尔巴哈，“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其“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可是，由于他说过“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等话，最终在派别归属上还是被恩格斯划成了唯心主义者，理由是：“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②看来，也正是在承之久远的分断模式中，费尔巴哈被裁成了两截。

恩格斯认为，和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但是，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即：“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才在这里“开辟出来”，而这一发展并超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理论标志，则是马克思发表于1845年的《神圣家族》^③。我们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除了在唯物论上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有用部分外，其他如方法和内容等，则间接来源于笛卡儿以后的哲学而直接采自黑格尔体系。如果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前面加一个负号，便可以得到类似于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内容，这恐怕也是恩格斯评语的真实内涵：“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④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及其认识论的理论来源问题，恩格斯讲：黑格尔“（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引者注）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⑤更谓：黑格尔“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237页。

③ 同上，第224、237页。

④ 同上，第222页。

⑤ 同上，第216页。

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①列宁也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②

正由于这根与以往哲学间所无法剪断的脐带的作用，使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至少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1. 凡事均要依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对立关系而一分为二，即找出相互斗争的矛盾；2. 表面看，似乎对“二元论”及其相关理论持彻底否定态度，认为，要么唯物，要么唯心，对动摇于两者之间者，一般都划归至唯心主义。对笛卡儿然，康德然，对“不可知论”的首倡者休谟亦未尝不然；3. 强调对抗的辩证法，即“强调对抗之间斗争的一面。黑格尔像赫拉克利特一样十分重视斗争。他甚至暗示，战争在道德上高于和平。如果没有外敌外患，那么一个国家在道德上就会变得软弱和颓废。显然，黑格尔在这里想到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战争是一切之父”^③。故该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斗争哲学”；4. 对历史的偏爱，使黑格尔导出了辩证法的原则，而辩证唯物主义也正是在历史领域超过了费尔巴哈；5. 对不切实际的终极原则的提炼，如带有唯一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只可以通过物质存在而知之，形而上学与怀疑论无需存在。

只是，这些特征本身即表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本旨仍然是“两元分立”原则。因为对一对儿对立顶中一方的特殊强调和偏重本身，已表明了对另一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首肯和默认。只是它要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容混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不容兼顾，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不能含混，每对范畴的关系非此即彼，非白即黑。它导源于主体与客体、即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极容易使整个世界发生普遍的分裂，因为它可以把一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3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2页。

③ 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对象都一分为二，并使双方绝对地对立起来。表面看来，“对立统一”原则似乎可以使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可是这种统一经常是建立在一方克服另一方的基础上的统一，因为在两者的统一部分当中，几乎不存在或很少存在被克服一方的固有因素。而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上的表述，颇为了然，即：同一是相对的，而斗争则是绝对的。亦即：“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 而以对立两分为特征的斗争性又自然引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两大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说，相对于形而上学的量的增减，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质量互变问题上更看重的是质变，而质变是通过斗争来实现的。至于由斗争所造成的克服行为的不断进行，又自然产生了以“克服”的同义语“否定”为特征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样一来，现象与本质、必然和偶然、有限和无限等都截然地对立了起来。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生产斗争；而在群我人际间，则表现为阶级斗争。关于认识论所带来的根本性影响，有学者撰文指出：“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个体化是导致二元分裂的根本精神原因，人与世界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分离，自我内在的分裂，都首先是个体化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分裂，它引起自我否定和异化，从而导向自我超越。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内在张力主要植根于这种意识的分化和矛盾上。”^② 它构成了一种范式，即：“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② 彭越：《一元和合与二元分立》，《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① 这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模式。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是阶级斗争，它已被概括为除原始状态以外的全部社会特征。以下的论述，亦当本此而来：“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 然而，无论是构成阶级斗争的甲乙双方，还是相互对立的历史观，都是“两元分立”哲学在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所谓“阶级斗争”，按通常的解释，是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辩证唯物史观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以思维或精神为转移的存在或物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由物质存在来决定，这恐怕是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所在。显然，这里的唯物主义与18世纪的唯物主义已无关系，它所指的，只是产生社会现象的“物质——经济”原因。当我们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归因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时，整个社会便自然要以经济状况为唯一划分标准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而阶级斗争在经济生活中又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相比之下，辩证唯物史观比较看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除了当他们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要求而发生蝉蜕时能够引起片刻欢呼外——即除了它们顺应和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那一刹那是可尊敬的，在其他时刻里，它们便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可咒的存在——因为生产力这一最活跃的因素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提出使它们难以时刻作答的新的要求，而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直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24页。

生产者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革命过程中，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生产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自由民相对的奴隶、与贵族相对的平民、与领主相对的农奴和与行会师傅相对的帮工等，“一句话”，即“被压迫者”阶级^①。这恐怕是唯物史观中阶级倾向主义之所自来的逻辑根据。当着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尚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缓解和抑制时，二者的斗争是隐蔽的；而当量的增长达到极限时，公开的斗争——辩证唯物史观所称的“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然而，这里似乎有一个理论上的“怪圈”：既然矛盾是由“物质——经济”原因引起的，那么，解决该矛盾，也必须要以“物质——经济”行为为手段，即：成以物质，毁以物质。而“毁”本身又意味着新的“成”。“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一提法本身，实际上等于宣布了文化意识形态的调节功能在冲突面前的无力与无用。于是乎，以毁灭对方（自然是被压迫阶级起而毁灭压迫者）为形式的武装斗争（物的冲突）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该理论完全真诚地相信，这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而这一必然的观念，又透露出黑格尔关于逻辑统治世界这一信念的余绪，即政治冲突的结局就应该总是以建立某种更为先进的制度为目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命题所暗示的其本身不可能达到任何最后静止状态的特性，则使人们难以相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果真就不会发生革命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②，而从未讲过倘无阶级冲突这一动力，社会进化将怎样实现。^③这种“怪圈”之所以产生，大半是因为其理论中手段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页。

③ 参见罗素：《辩证唯物主义》，《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